

忠实而又灵活的中国文学译介：《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述评

Loyal and Flexibl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Review of *Journey of Sinologis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陈开举 (Chen Kaiju)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朱振武教授等著的《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填补了对汉学家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的空白。该著评介的英、美、澳汉学家在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中的主要工作环节如作品选择、中西文化融通、译文标准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展现了相似的显著特点，值得中国的文学外译者关注和借鉴。该著高度赞誉了汉学家们在中国文学英译方面的卓越贡献，强调文学翻译工作中必须贯穿着主动的文化自觉和翻译自觉，在忠实于原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中国文化精髓/精神的原则下，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充分发挥译者的自主性、创造性，以提高译作在目标读者群中的接受性，使文学翻译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中西文化的融通。

关键词：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文化自觉；文化融通

作者简介：陈开举，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教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文化研究、文化哲学、翻译。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kes a core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strategy of “going out”. *Journey of Sinologis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Professor Zhu Zhenwu et al., fills the gap of related studies. As reviewed in this book, the 21 British, American and Australian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ors have demonstrate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ifferent translating phas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as text selection, translation criteria and reading effec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target readers. Their success is surely valuable to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in their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ighlighted in this book are the prominent contributions of the reviewed sinologists' meticulous and abundant achievement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ir loyalty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essence/spirit entailed in the original texts, and their creative,

flexible, and enchanting linguistic skills in promot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ir translation to suit the reading habits of the target readers. Such qualities of culture-awareness and translation-awareness have proved invaluable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fusion of Sino-Western cultures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sinologists;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cultural awareness; cultural fusion

Author: Chen Kaiju, Ph.D in cultural studies,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at School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cultural studies,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Email: 200010931@oamail.gdufs.edu.cn).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题中应有之意。这个系统工程中，一个“走”字充分说明了这个过程是一个主动的、有意识的、有明确目的的文化传播过程。随着中国文学外译发展到自觉阶段，有计划、成规模地推进，促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空前的繁荣。对该项学术研究系统的反思、研究渐次展开。但是，对国外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翻译方面的研究则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朱振武教授等著的《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下简称“《汉》”）填补了这个空白。可以说，该著是“中国文学走出去”学科化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全书按照汉学家们所属的几大主要英语国家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三大部分对汉学翻译家们的中国文学英译作了综合评价。其中英国8位、美国12位、澳大利亚1位。对于汉学家们在中国文学英译中的卓越贡献，评述者们给予了一致的高度评价，体现在对细节和内容的精致安排和处理中：每篇均以对仗/对偶句为篇名，概括出每位汉学家英译的历程、细述汉学家们的中国文学翻译渊源、重要作品翻译过程、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并在文尾详细列出其成果，彰显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一、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成功之道

《汉》著中评述的汉学家们均是所在国家中国文学英译的代表人物，其译介事业的成功源于不可缺失的学术素养，这里仅从他们严谨的学风及其与中国文化的良好互动两个方面加以简述。

（一）严谨的学风

其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中既要遭遇中国学者也要碰到的问题，还会经历额外的困难。凭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化作他们长期的努力，达成了其汉学英译的突出成就。

一方面，双方在中国文学英译的全过程中同样经历着诸多的共同体验：译前，同样要经历作品甄选和文化价值评判；翻译中，同样经历对原作意义和风格的理解、考证和译成目标语时的处理；译成后，同样经历着社会接受的考验，如读者问答、与批评界的互动，以及推广环节中的某些必要工作。另一方面，面对非母体语言、文化，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考证过程中经受的资料匮乏、缺少同行咨询探讨等困难必然更多、更大。

实际翻译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汉学家们全身心的投入和严谨的学风。如英国汉学家翟里斯无与伦比的汉学英译成就与他在中国长期而全方位的生活和研究密切相关：足迹踏遍中国沿海、笔触涵摄中国社会多个方面。罗慕士以近 20 年的时间精译《三国演义》，近 10 年的时间翻译《道德经》；威廉·莱尔将汉学、译学、从教有机结合，其鲁迅研究、著述、翻译相得益彰；芮效卫潜心数十载翻译了《金瓶梅》1-5 译卷 / 本；韩斌为了专注于中国文学翻译，竟于 2011 年毅然辞去了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讲师一职。

（二）与中国文化的深度互动

对文学作品准确的理解是做好翻译的前提，这离不开对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充分了解。《汉》在这方面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以相当的篇幅挖掘了这些汉学家们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渊源和良好的互动关系。《汉》书中对每位汉学家在本国、他域及来华学习、研究、考证、交流中华文化及其关注和选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做了大量的介绍。

除了威廉·莱尔和安德鲁·琼斯，其他 19 位汉学家们都采用了符合汉文化习惯的汉语名字，体现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本著的评述者们将他们的名字巧妙地以各种修辞方式嵌入文章的对偶句标题中，概括出他们的卓越贡献和学术特点。早期的汉学家如翟里斯，因为种种际遇，长期在华工作、生活，积淀起深厚而全方位的汉学研究基础。翻译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楚辞》、《离骚》、《石头记》的霍克思也在交通极不便利的时代远涉重洋来华研习，并见证了 1949 年的开国大典。新中国以来社会的全面发展极大地方便了汉学家们来华体验、交流和生活。《聊斋》的英译者“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白亚仁一向不吝自己来华交流访学的时间，每有会议或是朋友相邀共商学术，他总是欣然前往，而后满载而归”。（朱振武等 71）为了准确理解《马桥词典》，蓝诗玲于 2000 年和作者韩少功一起亲赴“马桥”，实地体会作者的用意和作品中的生活背景。

很多汉学家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亲身体验往往超出了纯粹的文学作品翻译所需，通过交流将源文化与自身生活融为一体。英国汉学家狄星 1993 年大学刚毕业就毅然选择来贵州支教及后来她与中国学人、学界之间的紧密交流。刘文杰评介了韩斌与作家韩东、曹锦清等相识、交流的情况。汉学家们回国后也会对本国相应社会文化生活形成相应的影响，如霍克思改革了牛津大学中文课程，增加白话文的教学。

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汉学家们的人生基本上都透露出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儒雅、仙风道骨的风范。通过他们的工作、生活、治学等言传身教地传播，影响周边的人们，本身就是极好的文化传播之道。文化是人的真正的家园，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之研习、翻译中国文学的经历乃是找到了真正的人生、事业和精神家园，因此朱砂以“浪子回头成正果”为题评述了他的成功转身。杨世祥指出翟里斯在诸多工作上的不得志，而他从外交界的黯然离开却成就了英国汉学界光辉一页的开始。长期的汉学影响甚至会重塑其人生观、价值观，成就了一些汉学家的隐士生活，如赤松、闵福德等。打动他们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风格等文学形式上的美，而是对中国文化精髓理解后的认同，促使其努力实现中国文化和他们母体文化之间的融通。

二、本著关涉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

同为中国文学翻译、研究、教学的学者，本书的作者们表达了向他们致敬，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努力，也提出了诸多中国文学外译中值得借鉴的特点，凝成了该著独特的价值。

（一）文学翻译的标准

除了文学翻译中信、达、雅等传统翻译标准问题，本书一再强调了目标读者群的接受度问题，值得中国学者文学外译中高度重视、学习和借鉴。

论及译入读者群的接受度问题，霍克思提出了文学翻译四原则，认为有时必须对原作品做适当的改动。获得 2015 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的英国汉学家韩斌充分强调了译者自主性，强调归化，即译入语的接受性。狄星强调“汉语双关语中的微妙之处几乎是不可译的”（朱振武等 89），如何译只能由译者灵活处理，可谓一语中的！蓝诗玲坚持“以归化策略为主，注重中英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忠实性再创造’”。（朱振武等 103）这一点用葛浩文的话说，就是要强调译者的“创造性”。

归化也好，创造性也罢，灵活度的衡量尺度是什么？答案是在忠实于原作的前提下，充分照顾到译作在目标受众中的接受度。杜迈可“善于把握中国文学之精髓，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致力于传递原作的地道特色。一方面，忠实地译出原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核心中国文化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失去这个原则去翻译，就会丢失掉原作品的精髓，就是失去了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在具体词语的选择上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性属于创造性的翻译艺术。市场经济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欧美汉学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读者接受意识，从作品的选择、翻译中的情节处理、异化与归化策略的选用、译作的发表与推广、与源文化之间的互动交往等方面积累了诸多成功的经验。

（二）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变化发展特征

汉学家们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涵盖古今，体裁多样。早期的汉学家接触的多是中国文化经典作品。与之相应的是，他们集中译介了中国经典文学作

品。如翟里斯译《聊斋志异》、《三字经》、《庄子》；霍克思和闵福德译《红楼梦》及后者对《易经》的译介；罗慕士译《道德经》、《论语》、《三国演义》，等等。后来的汉学家们将翻译的重心转移到现当代作品，如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对鲁迅和老舍的译介、研究；白睿文长期精研细译老舍；英国汉学家狄星、蓝诗玲，以及1978年出生的米欧敏等，体现了向大众文化作品转移的当代文化发展特征。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也译介了大量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当代文学逐步成为汉学家英译的重要文本源，莫言获得诺奖更是对汉学家英译中国文学的褒奖。

另外，汉学家翻译的专业化发展趋势，如蓝诗玲本科即以中文为专业，后续学位和研究工作也围绕汉学、中国文学翻译展开；狄星、蓝诗玲、米欧敏有着相似的科班化教育和翻译经历。多数汉学家们除了中国文学的英译，还从事汉学研究、著述。如罗鹏就亦著亦译、安德鲁·琼斯既翻译也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大部分当代汉学家虽然大多从事着多种跨界工作，但中国文学翻译始终是其工作的重心。

（三）中国文学、文化的地位问题

文学担负着个人与社会之人文化成、启迪心智、提升审美素质等其它文化形态难以替代的重要功能，传统上一直属于主流文化形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属于文化教育、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承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深受人们的喜爱。跨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与交流是满足人们对文学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化形式的丰富、多元发展，以伦理、教诲功能为己任的文学经受着以审美、娱人功能为主旨的其它文化形式的强力冲击，这使得以人文关怀为己任的文学由于缺乏了直接的实用性而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后现代文化娱乐化的泛化，读图时代的到来，且随着网络、新媒体传播形式强势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传统的文学阅读、体悟方式进一步式微，文学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回到中国文学翻译话题本身。中国文学有古典、现代、当代之分。古典中国文学对应的是最成熟、最稳定的农耕文明社会形态，而诠释文明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的中国古文学全方位表征了所对应的社会秩序即（儒）“礼”，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正是这些优秀的特质，使得不同时代的汉学家们克服重重困难，反复译介中国古文学文化经典，如《道德经》、《易经》、《红楼梦》等。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鲁迅、老舍等多位作家的作品吸引了汉学家们的译介，但仍相对较少，这与我国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型起步晚、处于现代性的学习者角色是分不开的。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了现代文明理性至上、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文化危机。人们回望历史，用返璞归真的办法进行纠偏，传统汉学间歇式地引起学界的回溯、译介，希冀找出良方，应对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遭遇到

的问题。同时，基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探索、生成新的文学作品。

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一道迎来社会渐次向后现代文明、文化的转型，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的式微和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持续进步，大有后来居上、引领向后现代信息文明的转型之势。诠释、设计、优化、滋养生活的文化、文学必将迅速反映时代变化和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人的生命体验，为世界其他民族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学资源，为外译、“走出去”提供好的作品源。这也是中华文化复兴和中国文学复兴的良机。

以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汉》著中两头大而现代文学中间小的深层次原因。深度挖掘反映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对人类具有独特贡献的文学作品，译介传播并自觉地紧扣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价值精髓/精神，就能做到忠实与创造有机的结合，恪守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

（四）翻译之于文化交流和传播效果问题

人类有意识的、成功的物种移植促成了文明的进步，如大豆、土豆、玉米等农作物从原产地向外的移植大幅度改善了粮食供给，成为人口大增长的物质保障。翻译、引入优秀的异质文化带来了文化的巨大发展，思想的革新可导致社会的革命性发展，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所谓“成功的”指被社会接受、认可、践行，否则，移植也好、翻译也罢，难以实现可能的价值，达到理想的效果。汉学家们既从彼域来，必知彼域事，对其所在的社会文化有着中国学者难以达到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他们围绕其社会语境下读者的接受性成功的“忠实的再创造”宝贵经验，很值得中国的文学外译者重视和学习。

信息时代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也是文学翻译与传播工程中值得研究的课题，从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在国外的传播效果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值得研究。尤其是近年来《木兰》、《功夫熊猫》等中国文学作品、文化要素在国外频频“触电”，传播效果值得文学翻译界的重视。此外，信息、网络新媒体在我国国内的发展很快，如何运用到文学的译介、改编和传播是新的挑战 and 机遇，值得研究。

最后，“中国文化走出去”是自觉的文化传播工程，国家每年做了很大的投入。毕竟，中国文学外译的彼岸语境是目标语读者群，这些彼域志儒的中国文学翻译工作从一个极好的角度玉成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宏愿，故建议把汉学家们的中国文学译入工作纳入资助范围。将中国的文学外译与汉学家们的译入有机地结合

【 Work Cited 】

朱振武等：《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历程》。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

[Zhu Zhenwu, et al. *Journey of Sinologis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7.]

责任编辑：张连桥